



国际关系史

第八卷

(1945—1949)



1950.12.1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际关系史

第九卷

(1960—1969)

本卷主编

卫 林(常务) 孙叔林
俞 源

GF08/22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锋

封面设计：雪 声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3 插页：4 字数：295000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601—5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关系史》编委会

主 编：王绳祖

副主编：光仁洪 蒋相泽 卫 林 周纪荣
石 磊 鲁 毅

编 委：卫 林 王贵正 王绳祖 王斯德
王德仁 王鹏飞 石 磊 卢明华
光仁洪 朱重贵 朱瀛泉 刘同舜
刘星汉 刘 陵 孙叔林 孙福生
李石生 李肇新 吴东之 吴世民
吴机鹏 何春超 张之芮 张文淳
张兴伯 张 志 张季良 陈文艺
周纪荣 洪育沂 俞 源 唐承运
曹中屏 黄鸿钊 谢益显 蒋相泽
鲁 毅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本卷作者：第一章 陈德照

第二章	俞 源	
第三章	孙叔林	
第四章	黄正柏	
第五章	王持明	刘江永
第六章	王安琪	程毕凡
	李相文	李谋戟
第七章	方德昭	
第八章	顾德欣	
第九章	熊志勇	
附录	卫 林	



—

国际关系史是社会科学领域中
的一门重要学科,不少国家都将其
列为高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并对之
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更为重视这
门学科,已取得了不少有学术价值
的科研成果。

多卷本国际关系史,战后在国际
上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学者勒努万主
编的8卷《国际关系史》,前苏联学
者葛罗米柯、赫沃斯托夫等主编
的5卷《外交史》。两书的内容均
偏重欧洲,亚非拉篇幅较少,且
各自强调本国在国际

关系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英美学者通贯古今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著作并不多见,断代性的著述居多。如美国学者D·希尔编著的3卷《外交在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历史》;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主持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用编年体记述现代国际关系史(至60年代),共出版近50卷。这些著作均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观点。

国际关系史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有的高等院校已开始研究和建设这门学科,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尤其从1980年12月成立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以来,对学科建设更为重视,学科队伍得以集中,科研项目有所落实。因此,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历史、现状)勤奋耕耘、协同攻关,先后撰写出版了本学科的专著、教材、史纲、辞书、大事记等数十种;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其中有的填补了学科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编辑或编译出版了国际关系史文件集、论丛、译丛、专刊、资料选集、历史长编等数十卷;专业基础教材《国际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或史纲)等已编著出版多种。同时,还编著出版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等综合性专业理论教材。

正是在取得阶段性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随着中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友好交往的迅速开展,广大的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集体努力,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国际关系史》。这部著作既应注重其学术性,又应重视其实际应用价值,尽可

能做到全面、系统、翔实,以供外交、政治、理论、新闻等领域的工作者以及科学研究人员参考和检索。经过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多年筹划和准备,组成了编委会,组织了撰写队伍,拟定了大纲细目,统一了编写体例,集体编著了这部10卷本的《国际关系史》。

二

国际关系史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复杂。但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社会一切多层次、多方面的繁杂关系通常集中反映为政治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是以国家与国家(包括国际组织)间的政治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注意国际经济关系、军事关系以及文化、宗教关系,并使之与国际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而且也不应忽视重要历史人物在国际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代时期,除各个民族国家外,又出现了许多非民族国家形式的行为主体。如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及各地区性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宗教等国际组织与集团。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各自成为单独活动的行为主体。尽管如此,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行为主体相比,在国际社会中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它们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各个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国家都受自己国家的制约、支配和控制。这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更增加了复杂性。

那么,应当用什么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揭示

其规律呢？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根据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各种理论与思潮，以及各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基础发生影响，但“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同时，在同一书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历史的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历史的“合力论”，对揭示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结果是极其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有大量的论著，都是以唯物史观来剖析和阐述历史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故此，我们编著这部10卷本《国际关系史》，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状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关系史学科的新体系。其次，着重于探索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来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运用历史“合力”的原理来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避免把问题简

单化。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随着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根据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实事求是地阐明历史事实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履行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

三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国家,随之就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开始是邻国之间,进而扩大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种关系,由此就有了国际关系及其发展进程。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

从17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逐步加强,世界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渐改进,促使各国和各洲之间政治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社会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任何地区的重要事态都会影响或牵动国际关系的全局。

正是基于国际关系这一历史发展进程,这部著作着重从17世纪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其下限暂定为本世纪的70年代末。全书共10卷,按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转折性变化,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648—1918年),即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1—3卷。

第二个时期(1917—1945年),即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4—6卷。

第三个时期(1945—1979年),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本世纪70年代末。为第7—10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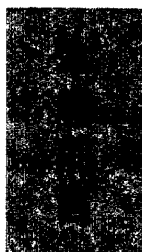
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今后将继续编写和出版。

参加撰写本书的作者都是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高职称教师与研究人员,又都是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的会员。

本书蒙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资助,并得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指导和在出版方面的优先安排,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关系史》常务编委会

1995年12月



60年代,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是一个进步的时期,也是国际关系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10年。这个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已体现出世界的主题逐渐转向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共同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始于本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进展到60年代,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影响已明显地呈现出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和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生产力的社会结合方面,也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相

互依存关系,因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时期的国际关系正是在这种世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

60年代国际关系发展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殖民体系时期,全世界约有 $\frac{2}{3}$ 的国家和65%的人民,从属于帝国主义各国的统治体系内。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国际社会中实际处于无权地位,不能充分发挥国家的对外职能。“二战”结束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万隆会议的召开,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到60年代末,亚、非、拉三大洲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总数已达上百个。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比,全世界的主权国家增加了两倍。这便给国际关系体系带来了一个新特点,即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国际法上享有主权地位的权力机构相互交往、联系。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争取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经济发展的自主权而积极斗争。1961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以及1964年77国集团的诞生,标志着第三世界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崛起。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经济上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与剥削,政治上获得独立并不意味着摆脱了国际旧秩序的控制,因而经济发展落后,在世界经济中属于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平衡,第三世界加强自身的联合,同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和控制,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三世界崛起所导致的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及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作为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或对抗

的直接动因虽然依旧是国家经济利益,但在 60 年代其内涵有了新内容。发展经济的意义和作用已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而是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为增加国民财富、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加国家实力的最主要手段。发达国家普遍把保障经济安全、发展经济关系和拓展经济空间,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欧、美、日等 20 多个国家组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在维护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同时,也纷纷制定和实施振兴民族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在国家之间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组织,以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60 年代的国际关系发展中,虽然军事和政治因素仍起着主导作用,但经济因素的作用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

制约战后世界格局发展的美苏关系,在 60 年代经历了重大变化。60 年代初,两国在欧洲的争夺,导致了柏林危机重新激化。这次危机虽然以苏联放弃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而缓解;但不久,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人类带到核战争的边缘。古巴导弹危机平息后,美苏双方都调整了核战略。美国以“相互确保摧毁”为战略目标,迅速建立起由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所谓三个支柱构成的战略核力量。苏联则实施一项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全面扩充军事力量的计划,并终于在 60 年代末改变了美国独占核优势的局面。双方积累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若干次,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巨大威胁。从此,世界各国的安全利益在求生存的方式上达成一致。制止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就在美苏各自增强核威慑力量的同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双边关系出现了新特点。一方面,它们继续在一系列问题上明争暗斗,竭力扩充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重要

问题上寻求妥协与合作。双方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防止核扩散协议,以及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力图维持日益受到挑战的两极世界格局,实现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愿望。与此同时,双方又都利用这一暂时缓和的时机,积极在地缘政治方面为下一轮的霸权争夺作好准备。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的对外政策致力于加强集团内部的控制。为了促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听命于它的指挥棒,适应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苏联竟然不顾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公开干涉那些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内政,甚至使用军事干涉的手段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否定这些国家的主权。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关系出现危机,其原因概出于此。到60年代后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竟恶性膨胀到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其首都布拉格的程度。在同中国关系上,苏联把中苏矛盾公之于世之后,又接连不断地采取种种恶化中苏关系的行动,最后发展到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此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长期陈兵百万,对中国施加强大军事压力。社会主义阵营终于破裂,不复存在。

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胜利,使它对自己的力量优势增强了信心。在同苏联达成一系列协议并建立了防止冲突失控的机制后,美国便全力以赴地扩大侵越战争,开始向越南南方直接投入地面部队,把“特种战争”升级到“局部战争”,并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企图通过“南打北炸”的战争迫使越南人民屈服。越南战争始于1961年,是美国实施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目的在于把越南南方变成在亚洲威胁和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基

地,作为颠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进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桥头堡。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1月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在这场持续到1975年的战争中,60年代是战争最激烈的10年,侵越美军兵力曾经达到54.3万人的最高峰。中国无保留地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根据越南人民的需要,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当美国在东南亚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它还企图在东北亚构建反共的区域性联盟组织,朝鲜半岛因此再度出现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最严重的局势。

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际,苏联乘机加紧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它利用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和美国的矛盾,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手段,迅速控制了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家的武器供应和要害部门。苏联在中东地区的进展,美国认为将会威胁其在欧洲的地位,并破坏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因而采取积极扶植以色列,帮助它更新武器装备的对策。两个超级大国在阿以矛盾中各支持一方的做法,对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战争期间,美苏又惟恐局势的发展变得无法控制,于是相互威胁以压制对方不要卷入战争。最后,在以色列获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美苏才共同迫使战争停火。这次中东战争,体现了美苏经历古巴导弹危机后扩张势力的特点,即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直接插手,而是在幕后进行交易。这也是中东地区在停战后形成有利于美苏渗透的长期“不战不和”局面的原因。

6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体现得尤其突出。美国的国力消耗于核军备竞赛和越南战场上,在经济实力对比方

面出现了明显不利于美国的变化。随着经济上呈现三足鼎立的局势,在政治上西欧和日本也开始与美国抗衡,不再屈从美国的意志、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西欧在外交上不仅坚持独立自主,而且力图对美政策发挥牵制和影响的作用。日本在实现了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删除不平等条款的愿望后,也开始修改“向美国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尽管西欧和日本在关系到东西方对抗的事务中仍不得不追随美国,但一系列事态表明,美、欧、日已开始进入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战后形成的帝国主义阵营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各种对立的力量互相制约和依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60年代这10年是动荡、分化、改组的10年。它表明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战后国际主要矛盾,已开始从两大阵营对抗转化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

本卷主编

1995年12月